

对《杨家城和杨家将》的商榷与补充

顾全芳

《延安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四期，载《杨家城和杨家将》一文，读后颇多感触，现提出一些补充及商榷性意见。

一、关于杨家城

杨家城唐宋时代叫麟州。宋代土官融在《友会谈丛》（卷下）中，对当时的麟州，有比较详细的记录：“麟府州在黄河西，古云中之地，与蕃汉杂居，黄茆土山，高不相属，极目四顾，无十步平坦。”又说，麟府州“人性顽悍，不循理法”，“俗重死轻生，侮法忘义。”不仅描绘了麟州的地理形势，而且记述了人情风俗。

麟州地势险要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欧阳修写过一篇《河东奉使奏章》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），内中说“今议麟州者，存之则固河东，弃之则失河外，若欲两全而不失，莫若择一土豪，委之自守。麟州坚险，与兵二千，其守足矣。”所谓“存之则固河东”，即据有麟州，则山西晋西北可保；若麟州不守，则陕北等地可危。欧阳修建议，守住麟州的最好办法，是用当地“土豪”。这里的“土豪”，即拥有地方军政实权的军阀。杨业的父亲杨信，就是世居麟州的土豪。杨信死后，他的次子杨重勋继续领有麟州。

“麟州城建于唐，历五代至宋，以州刺史杨弘信（即杨信）世守麟州，俗又称为杨家城。”（道光《神木县志》卷3）当为可信。《读史方与纪要》上也说：“唐曰麟州，宋因之，亦曰建宁军；端拱初，曰镇西军，领新秦县一，今葭州神木县是也。”（卷7）。新秦即麟州。宋代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，记有“麟州踞河外，扼西夏之冲。”“吕公弼帅河东”时，曾修建城堡，“至今城坚不陷，而新秦可守矣。”

现在的神木县，属陕西省；但在宋代，麟州却不属永兴军路（陕西大部）管辖，而属河东路。河东路除辖今天山西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外，还管辖麟州、府州、长州等黄河以西少数地域。所以，宋时人大多称河东麟州，而不是如今习惯称陕西神木。

麟州虽险，但以杨信之力，却难敌契丹及五代中原王朝。由于麟州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契丹及五代诸国，都想占有麟州。杨信据有麟州，既艰苦，又为难。他不得不依附于中原王朝，以拒契丹之侵扰。史载杨信“复命于周”，臣属后周；后来又臣属北汉。“信卒，子重训嗣，以州降北汉”，之后，由于“为群羌所围，复归款，求救于复府二州。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293）成为北宋的版图。可见麟州曾几易其主，在后周、北汉、北宋之间翻复。其目的，还是为了保住占有麟州的土豪地位，以免被契丹或他人所吞。杨重勋归宋时，杨业在北汉。重勋曾率麟州之兵渡河征北汉。兄弟二人各为其主。但幸末兄弟相杀。

二、关于杨业

至今一些书刊文论中，把杨业作为山西太原人。《宋史》杨业传等史书，记载杨业是并州太原人。那是由于杨业从年青时代起就到了太原，并且成了北汉刘家皇族的义子，改姓名为刘继业，成了刘家皇族的成员，所以被误认为是太原人了。其实，杨业从小生活在麟州，应为麟州人。这一点，与杨家将同时代的杨亿，是清楚地纪录下来的：“杨业，麟州人。”（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55）北宋的欧阳修、曾巩等文史大家，也说杨业是麟州人。

近年来，又有人提出杨信是山西河曲一带人，杨业的祖籍是山西保德、河曲。那也是张冠李戴了。杨信并没有长住山西河曲。曾任火山军（河曲）监军的，是杨嗣。这个杨嗣，曾与杨延昭长期并肩战斗在河北，称为“二杨”。但杨嗣不是杨家将中人物，而是另一个杨信的弟弟。这个杨信，根本不是麟州的杨信。山西西北地区，流传杨信是火山王的传说，说是杨业父亲和杨业，是那一带人，显然由此误传而来。

《杨家城和杨家将》说，杨信的大儿子是重勋，二儿子是杨业。那是弄颠倒了。杨业是杨信长子，曾巩在《隆平集》杨业传中是有记载的。为什么杨信死后，没有按照习惯，由长子杨业继承父业呢？原因在于杨业已不在麟州，而到太原刘崇手下当兵了。这不能作为杨业不是长子的依据。

《杨家城和杨家将》还说，杨业的孙子杨文广，有一个儿子叫杨贵迁，过继给贵州杨氏，杨贵迁的六世孙杨燾和其儿子杨价，曾抗金和抗蒙古人入侵。这些记载，起源于明初大学士宋濂的《杨氏家传》。这家传，已有传说的成分，不能作为确切的史料来引证。杨文广曾在广西任职多年，但没有到过贵州。他的儿子过继贵州杨氏云云，属于传说。

还有人说：“杨宗闵就是那些家居代州的杨延昭兄弟的儿子。”并且由此而引出一大批杨业的后代，都作为杨家将来对待（常征：《杨家将史事考》）。其实，杨宗闵及其子孙，根本不属杨家将。宋代刘引筒著有《茗溪集》，在卷48中有杨宗闵墓碑全文。文中说，杨宗闵“字景贤，代州崞县人也，曾大义信，以儒学称于乡，值五季乱，晦迹不仕。”这个杨宗闵的祖辈也叫杨信，但不是麟州武将杨信，而是“以儒学称于乡”的文人杨信。尽管杨宗闵是武将，并在山西和麟州等地驻防过，但决不属杨家将后代。把传说或杨姓人物，任意定为杨业子孙后代，称之为杨家将，不合历史实际。所谓杨家将，在历史上仅系杨业、杨延昭和杨文广等祖孙三代。

杨业在北汉近三十年。北汉是个外降契丹（辽国），内压人民的小国。在历史上，北汉向辽国称臣称儿，每年还要给辽国输送大量钱财。辽国自称太上皇，对北汉严格控制和干涉。杨业在北汉逐渐成为主要军事将领，但从来没有，也不可能去与辽国作战。史书上没有任何北汉对辽国作战的记载。因此，说杨业“在打击辽军中，‘屡建奇功，所向克捷’，人称杨无敌。”与北汉史实相背离。况且，杨业在北汉时姓刘不姓杨，不能称为杨无敌。无敌之称，是杨业归宋后，在山西代县一带抗辽获胜后人们对他的称呼。可以说，杨业在北汉时既未抗辽，又无功于人民与社会。

公元979年，宋太宗、潘美北伐北汉，兵围太原，杨业是守卫太原的主将。太原城

危急之时，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了宋太宗。这时，杨业没有投降，还在“拒城苦战”（《东都事略》杨业传）。宋太宗叫刘继元去招降杨业之后，杨业才放下武器，来见宋太宗，归顺了宋朝。因此，说杨业“劝说北汉主，归顺了宋朝，结束了几十年的分裂状态，博得了举国赞扬。”是不准确的。《续长编》等史书中，有杨业建议袭击契丹救兵数万骑，归投宋朝的记载。但是，这史料很不可信，所以许多著作否定此事。道理很简单：杨业始终在与宋军“苦战”，那有劝人投降而自己还在“苦战”的道理呢。劝北汉主投降宋朝的，不是杨业，而是另一大臣马峰。

杨业归宋后，宋太宗任命他为代州刺史，在雁门关一带抗辽防辽。986年宋太宗大举征辽，潘美、杨业兵出雁门，后奉命退还代州。辽军重兵压境。杨业主张坚守雁门关，监军王侁和刘文裕威逼杨业出战朔州，结果大败被围，杨业重伤被俘，绝食殉国。潘美虽身为主帅，但并未强令杨业出战。所以，认为“杨继业被潘美陷害，在陈家谷兵败被俘”，不合史实。宋人史书上一考记载，是王侁诬陷杨业如不出战朔州，便是“有它志”，即想逃跑或投敌。杨业无奈，只得以死表明心迹，领兵出战。被潘美陷害之说，是误认为潘美身为主帅，不阻止王侁而支持杨业，便是想借王侁之口而杀人。其实，北宋监军权大，负监视军队行动之责，潘美在监军面前很难对付，杨业更奈何监军不得。因此，说潘美陷害或害死了杨业，是不了解北宋军事制度的特殊性所致，也与后世传说的影响有关。在戏曲、小说中，都说潘美害死了杨家父子。但这是夸张甚至虚构出来的，不能作为史料。

三、关于折太君

《杨家城和杨家将》认为：杨业殉国后，“但奸贼仍然诬蔑他。直到后来折太君上书控诉，老将军的冤屈才得以昭雪。”杨业牺牲后，宋太宗很快处理了这一案件，用了一个左右的时间，即调查清楚，将王侁、刘文裕革职，潘美削职，追赠杨业为“太尉、大同军节度使，赠布帛千疋，粟千硕。”（《宋太诏令集》卷220）这就不存在“折太君上书控诉”的问题。杨业之军是全军覆没，杨业之妻既未参与军事决策，又未参加战斗，若要控诉，是空口无凭的。所谓“奸贼仍然诬蔑他，折太君上书控诉”之类，史无实据，不过是小说，戏曲和传说中的情节。

杨业之妻究竟是谁，宋人史书中只字不见。太君不是名字，而是对中级以上的官僚之妻、母的尊称。最早出现“折太君”的，不是在宋人史书笔记中，而是在元代戏曲中。元曲《昊天塔》、《谢金吾》中，出现了折太君，但几乎无所作为，是一个较弱的老太婆。明清以来，折太君（又叫佘太君）一直是艺术形象，很少有人说是历史人物。

最早肯定折太君是历史人物，并且肯定是杨业之妻的，是在清代的方志上。乾隆《保德州志》上说：“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窠村北”。《岢岚州志》上说：“杨业妻折氏，”杨业死后，“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，遂削二人爵，除名为民。”这便是折太君成为历史人物的最早纪录。这纪录，显然不是依据可靠史料，而是收录传说而成。但是，少数清代的文史学者，不辨方志所载之真伪，以讹传讹，硬把折太君加以肯定。例如毕沅在《关中金石记》中，肯定“考折太君，德虞之女，杨业之妻也，墓在保德州折窠村。”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中，更为画蛇添足，说什么发现过折太君墓碑

等等。其实，他俩既未见墓碑，更不见碑文，不过据地方志引申而已。

对于折太君被肯定为历史人物，有些学者是抱怀疑态度的。梁绍壬认为，“小说称杨老令婆曰余太君，不知何本。”（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卷8）康基田也提出，折太君“考正史，不传其事，姑阙所疑。”（《雷乘撰略》卷20）相比之下，道光《神木县志》比较慎重些。它记为神木的黄羊城，“俗传杨家继业妻折氏居此。”多处用了“俗传”等字眼，即折太君及其事迹，是来源于世俗传说，于史无凭。

可见，折太君根本不是历史人物，而是民间及文人们创造的艺术形象。倘若折太君真是历史人物，而且英勇无敌，帮助杨业作战，为杨业之死申冤，这样的女豪傑，广为纪录时事政治、遗闻轶事的大量的宋人笔记中，不可能没有纪載。

今天的陕北府谷县一带，从唐末五代到北宋，确实曾是折氏大族统治的。折从远、折德炭、折御卿等数辈，是府谷的“土豪”，有军权，曾多次抗辽和与西夏作战。现在，陕西还保存着许多折氏墓碑。但是，从记载折氏史事的史籍及墓碑中，也未发现有关折太君的片言只语，连名字也查不到。折太君是折德炭之女的說法，仍不可信。

在历史研究中，往往曾碰到这样的情况：本来是一些莫须有的传说，甚至是戏曲，小说中的虚构，但日久月久，传说与虚构，便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事实。一些文人和地方志作者，不去辨别真伪，将传说当作历史纪录下来。而后的文史研究者，又根据这种纪录，来论证本来是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，是历史人物和事件。这种恶性因果倒置，把历史与艺术混为一谈，这就要求今天的历史工作者，仔细考辨，去伪存真。否则后患无穷，无益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历史研究的提高。